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 12 号 (总 161 号)

2013 年 6 月 26 日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

内容摘要：2013 年 5 月 24-26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话会，三十余位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华人学者就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展开了深入探讨。

本期研究参考为与会专家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相关观点与建言，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改革；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

一、改革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与挑战

1、国际形势与挑战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总体有利。美国丹佛大学教授、中美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认为，当前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空前宽松，这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很大主动权。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世界各国对中国非常关注，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深刻地影响国际格局的调整。

中美关系是当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将中美两国描述为“利益交汇点”，认为同舟共济、妥善处理两国关系是维持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赵穗生和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引述了李光耀和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判断，认为“中美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中美两国间的冲突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他们认为，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兴大国关系”的概念在美国广受认可，这给两国扩大合作、实现共赢创造了机遇。

然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刘亚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在内的部分与会嘉宾指出，中国在 2008 年后处理与周边邻国关系时，遭遇了诸多危机与挑战。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认为，中国在外交上强调双边关系，对多边机制的参与不够充分。

2、国内形势与挑战

十八大之后，社会各界对改革抱有很高期待，然而当前的国内形势和三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改革面临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对体制和政策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利认为，过去的增长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收入、低土地价格和低环保管制之上的，这种增长模式在未来能否持

续、还能持续多久，需要认真思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认为，中国已经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现有的4亿农村劳动力中就业不足超过1/4，但是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已经47岁，其中女性超过60%。在这种状况下，财政收入是否可持续，城市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持续地补贴农村，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使经济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持续增加，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不容小觑。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提高了各行各业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的提升并非建立在机会平等之上，从而阻碍了增长的内生化、分享化和永续化。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宋丽娜强调，中国现有的很多问题不单单是源于不平等，而是源于制度不公平、法治不健全。

其次，利益的交错和思潮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共识难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和杨大利指出，改革分歧的根源往往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各利益集团相互掣肘，使得改革难以推进。刘世锦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摇摆和分化，使得改革的氛围难以形成。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认为，相较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界的活力和大家对改革的共同预期，现有的社会氛围尚不足推动改革的进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徐湘林认为，中国现有的很多问题并非制度问题，而是社会转型的问题。急剧的社会变化使得所有人都出现了错位，而新的规则尚未建立，使得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转型焦虑期，每个人都处于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中。杨大利引用了公民幸福感降低的数据，认为社会预期的不断增长给改革带来了挑战。

最后，刘世锦还指出，改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对技术含量和专业化水平的要求也不断增加。对比不断增长的改革需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指出改革供给不足的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认为，对于改革相关的很多问题，研究上缺乏系统的积累，政策上的准备也并不充分。

尽管面对国内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但也存在一些有利改革的因素。徐湘林认为，矛盾积累和危机频发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为

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土壤。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张小劲和吴国光认为，现在从政府到学界都更趋于理性，有助于避免改革陷入激进或极端。杨大利认为，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所持资产的增加，将使整个中国社会更加理性审慎，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时机。

二、改革的总体任务与原则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田国强认为，改革的总体任务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刘世锦认为，这其中的核心是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和国家能力的转型。魏加宁将此轮改革的目标描述为“建立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需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政府和社会国民的关系，即“现代国家”的核心聚焦于市场经济、地方治理以及民主法治这三条脉络。

包括张小劲、张静、田国强、杨大利在内的多位与会学者认为，要进行渐进的、逐步的、持续不断的改革，一要有改革决心，二要有改革氛围，三要有改革路径。首先，中国所面临的是超大型地域和超大规模人口情况下的超大改革，形势严峻，问题复杂，需要领导层的决心、意志和前瞻力。其次，改革需要超越思想上的分歧，在全社会形成改革的氛围和共识。美国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宁认为，思想市场的开放应该是中国下一轮深化改革的基础。魏加宁、田国强等人也强调思想论战对于形成改革氛围的重要性。杨大利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指出，改革需要确立核心价值观，要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改革的原则和底线。最后，改革的路径在实际操作中也至关重要。张维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开展方向性明确的改革行动，改革作为抽象化的概念已被讨论多年，现在需要的是具体化的措施和步骤。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认为，改革的持续深化需要找到一条可以分散改革风险、分散改革压力，不断内生改革动力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改革若从小处着手、积小胜为大胜，将是体现政治智慧的策略性更强的方案。

在改革的逻辑和方法上，刘世锦强调了顶层设计和地方试验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认为，此轮改革需要全国性的方案和框架，而不同地

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又需要地方性试验来摸着石头过河，形成“倒逼”，因此要根据具体问题的不同性质而找到两种改革模式的结合点。魏加宁认为，在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时，应注重宏观与微观的改革政策配套出台。王宁认为，渐进式改革是自发改改革的必然结果，顺应改革的自然发展过程，不应目的性过强的设计进程，要保证地方和民间的充分自由，重视民间改革的力量。张小劲、徐湘林、张静强调，除了现有的倒逼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还要加强地方性的、领域性的探索与试点。殷剑峰指出，一些具体领域的改革必须保证中央的集中把握，自下而上的摸索有可能会造成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多位与会学者认为，改革要兼顾短期的风险控制和新制度的长期有效性。香港大学荣誉教授、经伦国际经济研究院研究总监肖耿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副教授黄严忠提出，要先面向可以解决的问题，先从群众关切的、既得利益阻碍较小、政治风险较低的领域入手，从而有效地控制改革风险。刘世锦认为，近期的改革政策要保证有利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提出，为预防系统性改革带来系统性风险，决策者应提前对改革的“不良反应”做出风险预案。然而，与会者普遍认为，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帕累托式的改进在当前中国难度极大。肖耿认为，新经济制度的建立，需以其长期有效性作为评价标准，新经济制度应能保证中国经济体系在 50 年、甚至 100 年后仍有效运转；以此为出发点而设计的经济机制惠及范围最广，恰能淡化短期的利益冲突。

方晋和田国强认为，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田国强指出，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内放开、对外开放是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点。刘世锦认为，国际秩序的新关键词是“开放、包容、可持续发展”，这对于经济体量已位于世界第二的中国来说，是行事规则和价值观上的挑战。因此新一轮的对外开放要解决规则问题、标准问题，要按照国际上的较高标准来倒推国内的改革，争取占领国际规则制定的制高点。他提出了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思路，强调以服务业的开放为重点，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魏加宁也认同了“开门搞改革”的重要性。赵穗生认为，中国应当更积极地融入国际体系中并担当更大的领导责任，参与提出议题和制定游戏规则。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与对策

1、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是此轮改革的任务。庄巨忠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论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他认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步履艰辛，经济效率低下且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差距依旧过大，金融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又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而这些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信号。

刘世锦认为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三位一体的目标”，即“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完善市场体系的重点是深化能源、电信等基础领域，以及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点是财税体制的转型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创新企业体制将是公平竞争、平等的保护产权、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保障。田国强也认为，让市场有效运转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要务，而发展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2、具体领域的改革建议

(1)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能力需要转型和再建设，建议建立“产权基础设施”。刘世锦认为，世界上市场有效性较高的国家一般具备很强的国家能力，即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能力。因此当前中国政府的问题并非是简单的监管过多，而是管理能力的缺位。

肖耿称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济机制为“鸟笼经济”，政府即为鸟笼，内部空间即为市场空间。随着市场体量的扩大，国家应重新进行基础性的建设工作，建立“产权基础设施”，例如明确定义土地产权和土地产权交易规范。文贯中认为，市场是政府制定和调整政策的信息来源，想要准确的信息，就要保持市场的活力。

严格控制地方政府举债能力，地方政府去企业化。黄益平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债务风险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力弱，借贷没有资产负债表可以参考，因此地方政府去企业化将是降低债务市场风险最为重要的举措。

反腐败与市场有效性会相互促进。黄益平认为，目前政府角色的

缺位和越位的表现之一是权力的扩大化，过分的权力滋生腐败，腐化的官商关系影响了自由市场的有效运行。因此反腐败将促进市场有效性的恢复，而有效的市场、充分的竞争机制也将遏制腐败。庄巨忠提出，应出台《反腐败法》，制定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回避制度。

(2) 国有企业改革

重新界定国有资产和国企职能。张维迎表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现形式不一定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主导恰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制度；目前国企的利润率在降低，腐败问题严重，合法性受到质疑。国企改革的方向应为国企民营化，具体应达到十年内国有控股率下降至 10% 以下。

肖耿认为，中国的国有资产不一定以国有企业的形式体现，国家可以继续持有国企 30% 的股份；从风险分散的角度出发，其他国有资产应该置换成外汇，投资于全球范围内顶尖的跨国公司，从而投资于中国自身和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市场。

推动国企的商业化经营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张维迎认为，国企缺乏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庄巨忠认为，国企应该真正按照商业化模式经营，例如，国企高管进行市场化招聘；同时，国家应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税收政策等方面为国企和民企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此唤醒民营企业和市场的积极性；此外，应将国企上缴给财政的利润提高到 50%，这样我国 GDP 可增加 3%。

定价权交予第三方。田国强认为，定价权是联系国家和市场的纽带之一，国家垄断特定行业，又掌握这些行业的定价权，市场机制定会失灵，因而定价权应该交予独立第三方。定价权的独立也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

(3) 财税体制改革

调整事权，再调整财力分配和支出结构。刘世锦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关系，继而重新配置财力。殷剑峰认为，中央财政应该首先承担全国统一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同时，通过提高要素的流动性约束尚未转型的地方政府。房产税、房产税的征收将是一场革命。刘世锦认为，存量部分征税是大势所趋，而征收房产税和房产税最大的障碍是财产和房产的信息不透明。殷剑

峰认为，因房产税改革阻力重重，应依靠其他方式打通省级以下政府的收入来源，但收支需要接受人大的监督。

(4) 土地制度改革和巩固农业生产

土地确权和土地市场开放。刘世锦认为，集体土地是否应入市交易值得讨论，而土地入市的第一步是完成确权。各块土地的边界需要划清，确权过程容易存在争议，因此保证农民在确权后能凭借土地而盈利是关键。文贯中和宋丽娜均认为，土地市场引导农民在农村市场化经营自己的土地，良性竞争、兼并，就会出现真正与土地分割的失地农民，这个农民群体的出现和迁移将伴随并促进城镇化的自然发展。

土地收入促使增长性财政盈余，而增长性财政支出应向公共财政支出转移。殷剑峰认为，经营性土地挂牌以后，土地作为原材料直接产生收入，造成了地方政府在增长性财政上的大幅盈余，财政的土地弹性显著，但呈现规模报酬递减效应。同时，土地出让金是偿还地方债务最主要的可支配收入，形成恶性依赖。因此中央政府应起带头模范作用，从增长性财政到公共财政转移，例如将中央的转移支付转化为全国性的公共资金。

牢固农业生产方式。蔡昉认为，目前的农业独立于市场经济而独立存在，农民收入虽然在提高，但农业生产激励制度不够，农民收入提高的份额与务农没有直接关系，农民的收入和土地有关系的比重不足 30%，且在逐年降低，农民即使有地也消极选择复垦。因此应加大务农鼓励力度，巩固生产方式和粮食安全。

(5) 城镇化与户籍制度

坚持大城市战略。宋丽娜提出，根据世界各国经验，城镇化应以大城市为依托，农村劳动力自然流向大城市，国家不应有导向性地干预大城市自然形成的过程。

防止过度投资。蔡昉提出，要防止此轮城镇化战略成为以往经济发展模式延续的借口，防止地方政府将此解读为拉动经济需求的机会。黄益平也提出，要防止城镇化与重新扩大投资划上等号，防止过度投资的问题恶化。

促进包容性的城镇化。蔡昉提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首要问题

是能否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刘世锦认为，社保牵连户籍制度改革，而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问题。刘世锦提出“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的构想，即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方案，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最低支付能力设立，在全国范围之内流动，覆盖最穷困的社会群体。庄巨忠提出，创造城市就业机会应是城镇化的前提。蔡昉、宋丽娜和黄益平都认为，农民工技术水平相对单一，进入正规部门工作的几率很低，而随着低端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放缓，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将会下降，因此应考虑农民工技能的培训问题，促进农民工技术发展和分层。

发展内生型的城镇化。蔡昉认为，以市场为导向、而非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将是内生型的城镇化过程，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的扭曲造成大量人为的伪城镇化。宋丽娜认为，市场缺位下的城镇化的效果将等同于又一次政府经济刺激，具体解决方案之一应是发展民营部门，如果允许民营企业中的精英群体扩大规模，将会激活城镇化的发展效率。

建立城市诊断系统。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鲍曙明建议，设计“中国的城市诊断系统”，把人口和经济数据整合，按照行政单元和空间位置认清各地区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统计数据，为城市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6) 金融体系改革

从金融约束转为金融市场化。刘世锦提出，利率市场化、放宽准入条件、资本项目开放是当前的几个突破口，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应该加快，甚至需要倒逼。肖耿认为，利率市场化的缺失造成金融资本价格和政府债券利率均存在问题。中国资本缺失严重，但土地、资本这些稀缺资本的价格却最便宜，因而政府在金融市场化方面的缺位造成金融市场的严重失调。同时，中国应防止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国内无风险债券利率向海外看齐，这也是政府的责任。

金融体制需集权式的改革。殷剑峰认为，当前金融改革有两种倾向，一是碎片化倾向严重，没有考虑和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套；二是自下而上的倒逼情况多发，风险控制等金融监管权下放至地方政府。而他认为，金融改革恰需要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金融市场化改革要

以财政体制改革为前提，在地方政府尚无约束的情况下，金融约束不能过快推进自由化，要从宏观经济型、资源配置型、结构型的监管转向谨慎型、组织型和保护型的监管。应限制银行对地方政府的贷款力度，以此迫使透明的债券市场成为地方债务融资的渠道。

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与对策

1、社会改革的任务

在社会领域，面对着预期增长、风险增加、流动性增强的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张静指出，需要进行社会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吴国光认为，改革需要解决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贡森认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有助于走向社会投资型的福利社会。

2、具体领域的改革建议

确立以保障公民权利和发展为出发点的核心价值观，促进改革共识。张静提出，政府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需要有构筑其组织行动合法性、正当化其所得利益的能力。为了赢得共识和支持，需要全社会、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价值共享和规则共享。杨大利介绍，美国社会常以“不作恶”的原则来衡量各个领域的制度和政策。高世楫认为，改革的道德基础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改革的价值判断可以从保障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社会权利入手。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立足于人的发展作为改革的原则和底线，以此重塑权力和职能的合法性、衡量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从而尽量避免利益冲突带来的相互掣肘。

发展社会空间，鼓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徐湘林和黄严忠提出，中国社会现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都是自上而下提供，需要在基层呼应建立社会组织去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杨大利也认为，中国政府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要忙于“救火”，从而变成了一个无限责任的保险集团。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充满风险的社会，因此，政府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

张静指出，现有的深层次社会管制的理念和组织责任的架构，已经无法应对流动性巨大的新的社会结构。“单位”作为准政府代理机构的职能弱化之后，相当一部分社会改革和政策找不到明确的执行责任主体，很多人也因此丧失了享有公共品的权利。政府之所以不得不

变成“全能政府”，是因为社会组织化程度不足，这与其生存空间长期以来被压缩和控制有关。包括张静、杨大利、徐湘林、贡森在内的多位与会学者认为，需要给非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创造平台，鼓励其针对基层诉求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吴国光认为，平行增扩社会空间、发展社会自治能力，不仅有助于社会公共品的提供，还有助于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稳定而缓和的国家社会关系。此外，增强社会能力提供了一种增量改革的路径，即通过在现有体系外部发展一个增量体系，来刺激现有的存量体系。

五、政府治理改革

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利的边界。周雪光将中国的国家治理概括为三重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正式与非正式运作的关系，以及名与实的关系。这三重关系保证了集权制度和灵活性操作的相容，但却造成了“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要走出这个恶性循环，需要在中央和地方划分清楚权、责、利的边界。把权力和利益下放之后，地方政府有动力和能力来履行职责，而中央政府免除了责任和连带利益之后，也有意愿建立新的机制来制约地方政府。他还认为，中央政府应该走出第一步，实行“蚕食政策”，把现有的领域逐个逐条划分清楚后再下放到地方政府。目前城镇化的发展正提供了契机，城市和乡镇都有可能成为权力、责任和利益的承载实体。吴国光提出，厘清央地关系，不仅要有地理上的分割，也要有维度上的分割，具体领域具体分析。

针对厘清边界的具体操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宣晓伟提出了引入第三方裁决的设想。他认为，美国通过联邦和地方法律同时作用，并依靠法院裁决来间接影响和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思路。张小劲重申了法治确权的重要性，并提出，在实际操作中不仅要有中央先行和顶层设计，还可以在地方建立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实验区，从而为下一步行动计划提供充分的信息和经验。

重建信访制度，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李连江认为，信访制度在近年来产生了偏离

预期的消极效果，培育了“超级访民”，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却削弱了地方政府向中央反馈信息和提出建议的权利。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信访制度的设计偏差：一是，信访制度的政治理念并非根植于法治；二是，信访制度承诺的是令人向往但难以实现的实质正义，而非差强人意但有制度保障的程序正义。要从制度层面解决信访产生的重大问题，需要重建信访制度，把民意的“上达”转变为民意的“表达”。

李连江建议，可以考虑把分散在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等诸多部门的信访机关和人员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各选区的人大代表、特别是人大常委，使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言论免责权和调查权，履行集中民意、表达民意的职责，依据调查向成为信访对象的一府两院提出质询，直至向渎职、失职、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提出罢免动议。他认为，重建信访制度可以产生三个积极效果：第一，将信访制度扎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主体，人民的意见可以通过其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平等地向执政党和政府“表达”。第二，人民代表享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亦面临着选举的考验和问责，制度设计保护并鼓励人大代表尽职尽责开展工作。第三，被信访的政府、法院和检察院部门和干部将获得程序保障的机会，就公民提出的问题和指控作出说明、澄清和辩护。李连江和徐湘林认为，将信访资源划归人大，有助于增强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增强各级人大的职能，从而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建立有效的监督与问责机制。高世楫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指出，公民的权利意识正在不断觉醒，但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民意的表达却相对不足。吴国光认为，为了防止民意的洪流泛滥走向极端，需要构建有效的参与渠道，使得民意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得到表达和体现。徐湘林认为，西方的民主过程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竞争式选举、日常性参与和协商式对话。中国在政治改革中可以适应性地采用并结合这些方式，拓宽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徐湘林还指出，政府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民众的要求，是提升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另一个挑战。他认为，现有的问责制度不够完

善，导致了出现危机找替罪羊的问题。为了对官员产生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激励，需要根据不同级别、不同职责制定一套系统的问责规则，问责是否只限于任期内也需慎重考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薛澜认为，现在环境、食品、药品等很多与民众生活切实相关的问题频频发生，表明社会监管体系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应该增强对社会监管体系的重视，建立有效地社会监督机制。

加强智库建设，促进科学决策。田国强和王宁均强调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田国强认为，活跃的思想市场和讨论氛围，有助于改革氛围的形成，从而为领导做出重大变革提供土壤。对于是否应效法八十年代、设立性质类似体改委的独立经济体制改革机构，多数与会者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建设智库、加快思想市场解放的意见则普遍赞同。薛澜提出，目前政府内部的研究力量过于薄弱，不利于政策制定，政府外部研究机构和内部研究机构的有机互动将推动双方研究能力的提高和思想发展。

庄巨忠建议，促进知识创新的制度改革应加快，公共基础科学的研发经费应进一步提高，而目前仅有 30% 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将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调整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陆玟璠 王晔 整理)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中心 A 座 15 层
电 话： (010) 64255855 邮 编： 100011
传 真： (010) 84080850 网 址： www.cdrf.org.cn
责任编辑： 任晶晶 电子邮箱： renjj@cdrf.org.cn
